

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¹

(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摘自拉萨尔 1852 年 6 月 24 日
给马克思的信)

序 言

照作者的原定计划，这本小册子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1901 年 5 月《火星报》²第 4 号)一文^①中所谈的那些思想。我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在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迟了些。推迟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 年）6 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³。当时自然要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为这次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 卷第 1—10 页。——编者注

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星报》的组织观点；无论如何，这次尝试成功就有希望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个派别的现象。读者知道，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而且正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⁴在第 10 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因此，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作者早就关心这些问题，还在筹划《工人报》⁵复刊时就想在这个报上提出来，不过这次复刊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见第 5 章）。原来设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尽可能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种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经济主义”比我们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用“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 1901 年 12 月《火星报》第 12 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的大纲^①），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派”对于《火星报》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表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

从头讲起，那我们就可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说明”。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说明”的尝试。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许下的诺言。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象“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都谈不拢？其次，阐述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点，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阐述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变成了说明“经济派”感到满意的手工业方式和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再次，人们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意见愈没有根据，人们愈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我们怎样才能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就愈要坚持这个“计划”。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派”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了；《工人事业》已经具有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整整一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业》进行的乍看起

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 我们就不能前进。

尼·列宁

1902 年 2 月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象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①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

顺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⁶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⁷之间，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⁸之间，民意党人⁹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¹⁰，德国的伯恩斯坦派¹¹，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

别 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 有时炽烈起来 火焰腾腾 有时又静息下去 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斯坦讲出来了，由米勒兰作出样子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伯恩斯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 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 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大量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论文里，都一直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有教养阶级的一代青年 都经常在受这种批评的熏陶 那么 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¹²，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斯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

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法国在这一次也没有辜负它历来的名声，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前言）^①。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制发展程度较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这么热心地、迫不及待地地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作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 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来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90—291 页。——编者注

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现在这种“批评自由万岁！”的叫嚷太象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¹³了。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

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¹⁴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最近（第 10 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作理论原则，而是当作政治要求提出来的，即在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这一问题时提出来的：“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第 36 页）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明确的结论： 1. 《工人事业》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 2. 《工人事业》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结论。

《工人事业》“特别”不高兴的是“《火星报》和《曙光》¹⁵喜欢预言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¹⁶必将决裂”^①。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类比，它

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作 18 世纪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见《火星报》第 2 号（1901 年 2 月）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¹⁷“无题派”¹⁸或孟什维克，至今都很爱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现在人们却宁愿默不作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象历史学家－思想家可能认为的那样，代表着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 黑体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用的 派别，包括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第 32—33 页)

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断定说“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坚决为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辩护，却拿不出任何的论据和理由。作者显然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那么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竟以该派代表人物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紧接着的关于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第 34—35 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充分的批评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法国人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偏激行为的害处”。

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直是“按伊洛瓦伊斯基方式”来研究历史¹⁹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要解释德国社会党为什么统一和法国社会党为什么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点，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

人非常法²⁰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加以比较，不必回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讲坛社会主义者²³）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法国人所以争吵是因为他们偏激，德国人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乖孩子。

你看，用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把维护伯恩施坦派的言论完全推翻的事实。伯恩施坦派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一个国家的伯恩施坦派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参看《工人事业》第2—3期合刊第83—84页）试图独自站稳脚跟。拿法国人“不肯调和”当借口，除了有其“故事性的”（诺兹德列夫式的²⁴）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话来掩盖很不愉快的事实罢了。

而且，就连德国人我们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

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杜林的观点的，人们甚至公开在党代表大会上纷纷责备恩格斯，说他偏激，不肯容忍，用非同志式的态度论战等等。莫斯特等同志提议（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²¹上）在《前进报》²²上不再登载恩格斯的论文，认为这些论文“绝大多数读者都不感兴趣”而瓦尔泰希（Vahlteich）则说登载这些论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说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出了力的：“我们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教授们要争论那么《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争论的场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们看这也是维护“批评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评派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

斯基及其他许许多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所以还能见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服从那个坚决屏弃伯恩施坦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²⁵，以及那个尽管措辞婉转、但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吕贝克决议²⁶。至于从德国党的利益来看，这种婉转的措辞究竟适当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场合下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还是可以争论的，简而言之，在评价用哪种方法拒绝伯恩施坦主义才妥当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拒绝伯恩施坦主义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是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一说法，就是完全不了解有目共睹的现实情况。①

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人事业》还向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显然它是认为我们这里有人冤枉了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究竟是冤枉了什么人呢？是谁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工人事业》始终避而不谈，没有一次提

必须指出，《工人事业》在谈到德国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问题时，始终只限于单纯转述事实，完全“不肯”说出自己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例如，在第2—3期合刊第66页上讲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²⁷时，竟把一切意见分歧都归结为“策略”，并且只是指出绝大多数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4—5期合刊第25页及以下各页上，也只不过是把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述一遍，并把倍倍尔的决议摘引一下；这里又是（也象在第2—3期合刊上一样）把对伯恩施坦观点的叙述和批评留待“专文”去谈。可笑的是，在第4—5期合刊第33页上说道：“……倍倍尔所阐述的观点赢得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赞同”，而稍后一点却又说：“……大卫发言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他首先就竭力说明……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毕竟是原文如此！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是1899年12月间写的；到1901年9月的时候，《工人事业》大概已经不再相信倍倍尔正确，而把大卫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来重复了！

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斯坦派！这里我们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事业》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业》第 10 期上的两篇文章都只讲《曙光》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如果是这样 那么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斯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工人事业》，不替“最明显的伯恩斯坦派”和批评自由讲点好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或者被人冤枉的是某个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还在继续玩那种从它一创立就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游戏。其次，请注意这第一次实际运用被大肆吹捧的“批评自由”的情况吧。实际上，“批评自由”不仅立刻表现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表现为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斯坦主义当作暗疾（照斯塔罗韦尔的中肯的说法²⁸）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现在却主张，为了治这种病，只要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就行了！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模仿……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惩罚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 同样的倒戈分子 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 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

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斯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俄国伯恩斯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那我们就自己来试试 把《工人事业》不愿说出来的（或许是它无法理解的）东西哪怕是简单地说明一下。

（三）俄国的批评

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产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 80 年代或 90 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受检查的书刊上打开了一条道路，虽然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习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作危险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

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然也就出现了不止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²⁹.....

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书刊上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结成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往后的“批评”发展明显地证实了）早在“联盟”还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①

既然如此 那么以后出现那种“混乱”是否应当由那些同未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最大的责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那里，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肯定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议可以比作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作政治协定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是指前面刊印的克·土林的一篇反对司徒卢威的文章，该文是根据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学术讲演写成的。见序言。³⁰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破裂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破裂不过是使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书刊上消失。在这种书刊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这有事实为证，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³¹）伯恩施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³²，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荐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 10 号³³。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可是，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书刊上。在人们转向“批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

主义”。

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我们只要指出无疑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臭名远扬的《信条》³⁴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

《信条》并不是编造出来的，但它的公布没有照顾它的作者们的意愿，也许，甚至是违反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把新“纲领”公布于世的本书作者已经听到一些怨言和责难，说不应该把发言者概述自己观点的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节，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的“经济主义”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害怕公开。这正是整个“经济主义”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真诚地拥护“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³⁶有《工人事业》（它因“经济主义的”文件在《指

指反对《信条》的17人抗议书。本书作者参加过起草这个抗议书的工作（1899年底）。1900年春，抗议书曾同《信条》一起在国外刊印出来。现在从库斯柯娃女士的文章中仿佛是在《往事》³⁵上已经知道：《信条》的作者就是她，而当时在国外的“经济派”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